

中国近代的 文化革命

• ZHONGGUO JINDAI
• WENHUA GEMING
• MING



发展与改革丛书



张锡勤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fazhanyugaige

CONG SHU





发展与改革丛书

中国近代的 文化革命

张锡勤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5号

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

张锡勤 著

责任编辑: 曲子玮

封面设计: 孙少江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区九站街1号)
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印刷·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1/32·印张10.5·插页2·字数245千
1992年10月第1版·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16-1725-0/B·28 定价: 4.80元

《发展与改革丛书》

总 序

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一个社会，生产力越不发达，经济文化越落后，她解决社会问题的可选择性则越小，反之，生产力越发达，经济文化水平越高，她解决社会问题的可选择性越大。人类的出路，在于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所以，我们这一套丛书命名为《发展与改革》。

积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之经验，我们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富国富民的唯一正确道路。欧美的资本主义模式，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客观基础，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也是此路不通。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痛苦摸索，终于找到了这条光明大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厦，有两块基石，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离开了这“两论”，也就没有中国特色了。为了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方面持续提高，逐步赶上发达国家。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

F686/10

128084 · 1 ·

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当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大方向、大原则确定了，但是，怎样达到既定的目标，有许多艰难的工作要做。例如，怎样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怎样把发展速度与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一致起来？在改革方面，最大的难点在于找到实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最终目标的途径、形式、步骤、方法。不少学者和企业家都指出了“承包制”不可避免带来短期行为、负盈难负亏等副作用，但是，又不可能一下子都变成股份制、合作制。那么，在承包制与股份制、合作制之间怎样找到一种过渡形式呢？诸如此类的有关发展与改革的重大问题，有待大家去苦心探索，深入研究。

出于历史责任感，我们龙江学派的一些学者高兴地接受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委托，计划在三、五年内编辑出版一套《发展与改革》丛书。这一套丛书不是代圣贤立言，或者注解现行政策，也不是单纯介绍外国的学术思潮，而是立足于本国，探讨发展与改革中的新课题，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略尽绵薄之力。

我曾经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张文达社长有一段对话：

我说：要不拘一格出好书，题材不拘一格，观点和文风也不拘一格，唯新唯好。

张社长答：我社要不惜赔钱出好书！

在今日一片赚钱声中，我们听到这种支持学术事业的声音，是多么惊奇，又多么兴奋啊！不少乡镇企业超过国营大企业，同样，小出版社也可以干出大事业，只要有这种为发展学术事业不惜赔钱出好书的方针。

人类学家麦克斯·格拉克曼曾经说过：“科学是一门学问，它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本书的作者似乎比傻

瓜还高明一点，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越上一代的天才呢？

熊映梧

1992年1月于冰城

目 录

导 言	(1)
一、中国近代文化革命的涵义	(1)
二、中国近代文化革命兴起的历史背景	(3)
三、中国近代文化革命的性质和主张	(12)
第一章 “道德革命”	(22)
一、“道德革命”的历程	(22)
二、对封建纲常礼教的猛烈抨击	(27)
三、对封建旧礼俗的批判、改造	(40)
四、对道德不变论的批判	(44)
五、对中国传统道德遗产的继承与改造	(49)
六、宣传“求乐免苦”的人性论、伦理观	(55)
七、提倡“合理利己主义”	(64)
八、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准则和理想	(74)
九、清除“奴隶性”，塑造新的理想人格	(80)
十、“道德革命”的影响	(89)
第二章 哲学变革	(92)
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传入与中国近代的哲学变革	(92)
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入与中国近代的哲学变革	(97)

三、对中西哲学异同和中国传统哲学特征的初步探讨·····	(119)
四、对宋明理学的清算·····	(125)
五、对天命论和鬼神迷信的批判·····	(132)
六、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与改造·····	(142)
七、旧范畴的改造和新范畴的引进·····	(150)
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特点·····	(166)
第三章 “文学革命” ·····	(173)
一、“诗界革命”·····	(173)
二、“小说界革命”·····	(182)
三、“戏剧改良”·····	(200)
四、白话文运动和推广“官话”运动·····	(208)
五、“五四”文学革命·····	(215)
第四章 教育改革 ·····	(227)
一、对八股取土的科举制度的批判和科举制的废除·····	(227)
二、要求兴办新式学堂的强烈呼吁和新式学堂的建立·····	(234)
三、清政府的办学活动与办学思想·····	(241)
四、资产阶级新教育思想的提出·····	(248)
五、蔡元培论五种教育·····	(260)
第五章 “史界革命” ·····	(266)
一、西方史学和历史进化论的传入,“史界革命”的兴起·····	(266)
二、对中国封建旧史学的批判·····	(269)
三、建设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原则意见·····	(275)
四、创作新史的设想和尝试·····	(281)

五、对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新的开拓性的研究……	(287)
第六章 “圣贤革命”	(293)
一、近代反孔运动的历程	(293)
二、维新派对孔子和儒学的触动	(297)
三、革命派和激进民主派对孔子和儒学的猛烈批 判	(305)
四、近代反孔斗争的影响和缺陷	(314)
结 语	(318)
后 记	(327)

导 言

一、中国近代文化革命的涵义

从19世纪末到“五四”时期，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相继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各种“革命”。以口号的形式被明确提出来的有“道德革命”（“三纲革命”、“纲常革命”）、“文学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史界革命”、“圣贤革命”等。除此而外，影响巨大的尚有哲学变革和教育改革。

所谓“革命”，这是借用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在这里，其含义大体与变革、革新、改革相当。正象20世纪初梁启超所说：“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其本义实变革而已”（《释革》）。后来，陈独秀也说：“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文学革命论》）。

从上面的这些解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就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作“革故更新”的变革，它乃是一场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发动、领导的，旨在使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文化革新、文化重建运动。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激进民主派固然

主张在文化思想领域进行“革命”，资产阶级维新派同样也大声疾呼，要求在文化思想领域进行“革命”。由于维新派把“开民智”看作是“兴民权”的前提，他们对这一斗争是高度重视的，他们是这场文化思想运动的最初发动者。总之，要求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进行“革命”，这是当时资产阶级新学家们的共同要求、共同主张。虽然他们在政治主张上存在分歧，但在这一问题上意见基本是一致的。

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西学东渐”，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发生变化以来，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便逐渐出现要求革新的意向。在鸦片战争时期，魏源便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要求学习西方先进工艺，并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以及“汉学”和“宋学”作了尖锐批评。在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从西方引进了基督教，并一度对孔子和儒学发动了猛烈的冲击。洪仁玕不仅主张学习西方“技艺”，而且在文化、社会习俗风尚等方面也主张革新。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在引进西方科技的同时，又翻译西书，并在中国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与此同时或稍后，一批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大力呼吁改革科举，兴办学堂，翻译西书，传播西学，并提出了改革旧礼俗的主张。但是，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作为一次文化运动、思想运动，正规说来是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中经辛亥革命时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

梁启超和陈独秀在中国近代文化革命的前后两个时期中，分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实际上是这场文化运动前后两个时期的主帅。梁启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史界革命”、“道德革命”等口号，并发表了一系列带有纲领性的意见。他在日本先后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对于推动这场文化、思想运动曾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平

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的优美文字曾经吸引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扩大了这场文化、思想运动的队伍。而陈独秀，则是新文化运动公认的领导者、组织者，他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轰轰烈烈的道德革命、文学革命和反孔斗争中，他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把中国近代文化领域的革命推向高潮，他作了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近代文化革命兴起的历史背景

从19世纪末到“五四”时期，中国文化领域所以先后发生“革命”，首先是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冲突，和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必然结果。

“西学东渐”并不始于鸦片战争之后。早在明朝后期，一些西方传教士即已开始将“西学”传入中国，并曾在某些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那时，西学并未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威胁，使它的地位发生动摇。而鸦片战争后，情形则明显不同。这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严重危机，中西的强弱盛衰已形成鲜明对比，西学的优越较之三百年前也更加突出。而且，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已开始形成，中国已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于是，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入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猛烈的冲击，使之面临尖锐、严重的挑战。它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并选择自己的道路。由于中西的强弱盛衰对比实在太鲜明、强烈，由于近代西方文化在发展阶段上高于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从鸦片战争起，几代先进的中国人都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即所谓“中学”、“旧学”）

进行再认识、再评价的过程。这两者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发现自己的不足，在文化领域要求变革、革新是自然的。在本世纪的20年代，作为亲历者、当事人的梁启超，曾回顾了这一历史过程，并作了生动的描述：

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于是以极幼稚之西学智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清代学术概论》20）

正是这种日炽的“对外求索之欲”和日烈的“对内厌弃之情”，引发出了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

梁启超曾将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历程，分为如下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因而首先从物的方面学习西方；“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于是进一步要求从政治、经济制度上学习西方；“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于是要求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改造（《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70年前梁启超的这一看法，今天已为多数学者所赞同。自然，这三阶段也是有交叉的。比如，在第一阶段，即已有人开始“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而在第二阶段，也已有人开始“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中国近代文化革命的兴起，正是先进的中国人“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的反映。

但是，把中国近代文化领域的革命仅仅看作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这是不全面、不准确的。毛泽东曾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

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694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领域所以会相继出现各种“革命”，无疑还有它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客观影响也是复杂的。从经济上来说，西方列强的本意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而不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它们的经济侵略，客观上势必要破坏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刺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626页）。于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诞生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他们要求学习西方，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变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代表人物渐渐懂得，社会变革是一项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的相互配合，同步进行。因此，他们在经济上要求自由发展民族工商业，政治上要求实现民主的同时，又在文化思想领域展开了广泛的活动和斗争。他们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亦即“中学”、“旧学”在某些基本方面与新的经济、政治是不适应的，它明显地阻碍了资本主义变革事业的前进。为了推动并指导资本主义变革事业的进行，就必须大力传播近代西方文化，并以此为武器，清理、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建立一种与新的经济、政治，新的时代潮流、世界潮流相适应的新文化。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文

化与新经济、新政治的关系时曾说：

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664页）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同上书，第695页）

这些论断显然也适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近代。近代的文化革命，乃是近代经济、政治的新变化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近代新的时代需要、阶级需要乃是近代文化革命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0页），中国近代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各种“革命”，正证明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变革，当时所面临的紧迫任务首先是启蒙。所谓启蒙，当时流行的叫法是“开民智”，它曾受到近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普遍的、高度的重视。开民智、启蒙的迫切需要，这是近代文化领域各种“革命”兴起的直接原因。

中国资产阶级最早活跃于政治历史舞台的派别是维新派。维新派是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变法纲领的。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所以失败，是因为洋务派仅仅着眼于军事、工业的近代化，而未能从“本原”上进行变革。康有为说，洋务派之所为只是“变事”，而非“变法”。由于未能从根本上变革，结果必然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徒糜巨款，无救危亡”（《上清帝第四书》）。梁启超也指出，洋务派虽也讲

变,但因不知“变法之本原”,结果必然“百举而无一效”(《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那么,什么才是“变法之本原”呢?他们首先分析了中国所以衰败的根本原因。谭嗣同说:“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报唐才常》,《秋雨年华之馆丛书》卷1)梁启超则更明确地指出:

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西学书目表后序》)

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能兴民权,断无可亡之理”(《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兴民权乃是振兴中华的关键。

但是,维新派从一开始提倡民权,便没有把“兴民权”看作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注意了民权与民智的关系,并长期为这一问题所困扰。在这一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梁启超的“权生于智”说。他认为,民权取决于民智,因此兴民权当以开民智为前提。他写道:

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使其智日进者,则其权亦日进。……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论湖南应办之事》)

在他看来,民权的增进与民智的提高绝对成正比,因此,当时的中国欲兴民权、欲图振兴,应“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一旦民智提高,民权就会自然到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也曾发表了类似看法。

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首先进行系统阐发的是严复。严复总的思路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要想富强，首先在于利民，而欲利民必使“民各能自利”，为使民能自利，就必须使其获得自由，但自由的取得，当以人民“各能自治”为前提，而人民自治能力的高低又取决于他们德、智、体诸方面基本素质的优劣。因此，提高人民德、智、体的素质，乃是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这里，严复所依据的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社会有机体说认为，社会如同生物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的强弱取决于每个细胞的优劣一样，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弱兴衰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素质的高下优劣（详本书第二章第二题）。依据这一理论，严复把国家民族的强弱兴衰、民权实现的程度与民智高低的关系，比喻为草木和土壤的关系。他说：“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否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势将“淮橘成枳”（《天演论》导言8案语）。严复所介绍的社会有机体说在中国近代思想界曾产生过广泛影响，几乎所有维新派思想家都把“开民智”视为兴民权必不可少的前提，对它十分重视，大力强调。

维新派认为，“中国之弱由于民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这个结论无疑是不全面、不正确的。他们宣传民权将随民智的提高而自然到来，这势必要引导人们放松争取民权的实际斗争。但是，他们认识到在一个愚昧无知、人民普遍没有摆脱旧思想、旧观念束缚的国度，无法实现民权民主，认识到兴民权并不单纯是一场政治斗争，不能孤立进行，看到了开民智与兴民权的关系，这是有价值的。他们大力呼吁提高中国人民的基本素质，进行资产阶级启蒙，重视开民智的工作，这无疑抓住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大题目，是应当肯定的。

稍后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革命派不同意维新派的基本结论。